

## 【译 文】

# 识字率、民族主义和共产党下台中的巨大差异\*

基思·达登、安娜·格里亚马拉-伯西

(Keith Darden & Anna Grzymala-Busse) 著，陈思颖译<sup>1</sup>

## 一、导论

为什么有些执政党尽管与摇摇欲坠的独裁政权体制紧密相连，但其后仍然可以继续执掌权力？这一现象出现在 45% 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它的卫星国。在这 45% 的国家当中，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第一次自由选举中保住了权力，而在另外一些国家，顽固守旧的共产党始终把持着权力，从未实行自由选举。但是在余下的那些曾经属于前苏联的 55% 的国家中，共产党输掉了第一次自由选举，并彻底退出权力中心。

关于共产主义的这些不同的退出模式，引起了学术界在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中的争论。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试图对这些不同的模式提出解释：共产党在第一次自由选举中的失去权力，与民主的巩固、成功的经济改革以及政党竞争<sup>2</sup>密切相关。与此相比较，那些幸存下来的共产党政权则仅仅引出了“名义上的民主”：（1）实行有选举程序的准民主制度，但并不培育竞争或者代议制；（2）反改革联盟崛起，他们从国家攫取个人利益并反对改革。<sup>3</sup>

与此同时，出现了对于共产党退出机制的许多讨论，来作为对共产党退出后发展轨迹的解释。首先，赫伯特·克切尔特指出，密切关注影响共产党退出的那些因素，并把其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会存在因果二个方面过度接近的问题，导致对“现象的因果链缺乏洞见”<sup>4</sup>。他的看法回避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共产主义的退出与积极有益（实现民主）的结果高度相关，那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种退出呢？第二，社会中对经济和民主的影响的各种机制目前难以确定。共产主义的退出是否是受到反共情绪和精英共识因素独立影响的因变量？共产主义的退出是为进一步民主和自由市场改革做准备的简单征兆，还是后续改革的必要非充分条件？第三，至今为止几乎没有人解释共产主义退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也不知道这些原因自身如何与共产党垮台的结果相连。这些缺陷导致了如下的批评：政治科学和共产主义的垮台一样，关注于一套错误的解释因素和机制。举例来说，一个显著的疏漏就是没有重视**一党专政理论**和那些维持其效力甚至合法性的因素。<sup>5</sup>

涉及所有这些分歧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需要说明，为什么同为共产党统治，客观上却会导

\* 本文英文题目为 “The Great Divide: Literacy, Nationalism, and the Communist Collapse”，刊载于 *World Politics*, Volume 59, Number 1, October 2006, pp. 83-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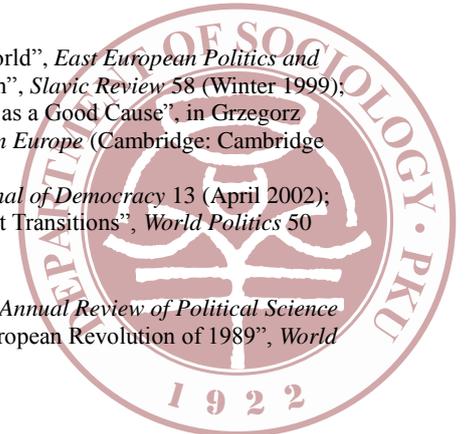
<sup>1</sup> 译者陈思颖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sup>2</sup> M. Steven Fish, “The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Reform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12 (Winter 1998); Valerie Bun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m”, *Slavic Review* 58 (Winter 1999); Herbert Kitschelt, “Accounting for Postcommunist Regime Diversity: What Counts as a Good Cause”, in Grzegorz Ekiert and Stephen Hanson, eds.,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sup>3</sup>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April 2002); Joel S. Hellman, “Winner Take All: 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World Politics* 50 (January 1998).

<sup>4</sup> Kitschelt (fn. 1)

<sup>5</sup> Stathis Kalyvas, “The Decay and Breakdown of Communist One-Party Regim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 (1999); Timur Kuran, “Now out of Never: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n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 of 1989”, *World Politics* 44 (October 1991).



致如此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说，为什么共产党在有些国家失去权力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没有失去权力？我们认为，最终根源在于前共产主义的学校教育煽动和培养了民族主义思想，从而导致了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丧失。共产党退出权力事件本身，就是数十年积累的民族不满、失衡对比，以及反对派精心在民众中维持的对外来强加的共产主义制度敌对情绪的结果。文章的第二部分梳理和检验了竞争性解释，第三部分调查了学校教育的模式，第四部分提出一个替代模型，建立了一个因果链，用来连接大众教育、对民族国家和其合法权威的看法、反共情绪的上涨以及共产党的退出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不喜欢共产主义，更有可能推动共产党离开权力。第五部分进行总结。

## 二、现有的对共产党退出的解释

与共产党政权垮台及随后的政治转型有关的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对“共产党退出”的多样性的、相互竞争的解释。这些文献将导致共产党退出的背后力量定位于时空连续性，从长期的结构性力量（如地理）开始考察，然后是前共产党时代的遗产，再到共产党政权下台的直接原因，如反对派的力量等。

一个对后共产主义轨迹的著名解释关注于结构因素，即一些有利的地缘政治的设置能把这些国家安置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圈附近，这些国家与西方国家共享其启蒙传统、贸易潜力和传播民主思想。正如科普斯顿和赖利 2000 年所证明的<sup>1</sup>，这种影响的一个表现在于“接近西方”（以国家的首都与柏林或维也纳的地理距离来计算）与推动共产党退出的结构因素、民主改革以及市场自由化之间显著相关。这些地理设置，方便了国际组织发挥有利影响。“一定程度上，这些有差异的外部诱因是机构改革、国家的行为、大众话语等方面在后共产主义时代有差异的原因”<sup>2</sup>。毕竟，最近的邻居也是欧盟和其他西欧国家行动的最强烈关注的目标。如果作为参照系的非共产主义邻国是德国或者奥地利，而不是阿富汗和伊朗，那么共产主义就不那么令人满意。地理接近性同样培育了一些国家对欧洲的归属感。

第二个有影响力的研究取向，探讨了前共产主义发展的遗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治经历如何塑造了共产主义时代及以后的政治活动<sup>3</sup>。其中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政治经验，塑造了共产主义时代及以后的政治途径。经典的“现代化”解释中，财富、建国前的工业化水平、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民主发展和维护政权稳定都是非常关键的<sup>4</sup>。在以上方面，各国之间在共产主义时期一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尽管相对于西欧<sup>5</sup>，东中欧国家被描述成落后的边缘地区，但是它们的发展水平总是高于中亚等地区。因此，共产党的退出，可能是这些国家前共产主义时代的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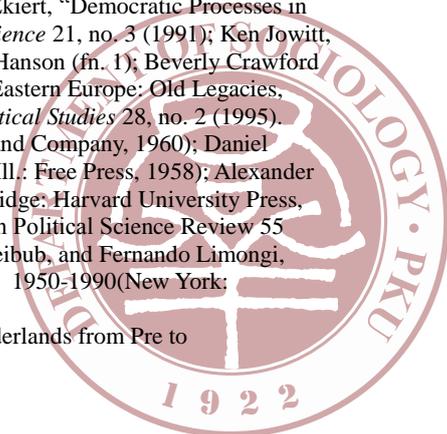
<sup>1</sup> Jeffrey S. Kopstein and David A. Reilly, “Geographic Diffus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World Politics* 53 (October 2000); Anna Grzymala-Busse and Pauline Jones Luong, “Reconceptualizing the State: Lessons from Post-Commun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30 (December 2002).

<sup>2</sup> Kopstein and Reilly (fn. 5), 25.

<sup>3</sup> George Schopflin, *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 (Oxford: Blackwell, 1993); Grzegorz Ekiert, “Democratic Process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A Theoretical Reconsider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1, no. 3 (1991); Ken Jowitt, *A New World Disor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Ekiert and Hanson (fn. 1); Beverly Crawford and Arend Lijphart, “Endur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Old Legacies, New Institutions, Hegemons, Norms and International Pressur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8, no. 2 (1995).

<sup>4</sup> Seymour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 1960);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8); Alexander Inkeles, *Becoming Modern: 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Karl W. Deutsch,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5 (September 1961); see also Adam Przeworski, Michael E. Alvarez, Jose Antonio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sup>5</sup> Andrew C. Janos, *East Central Europe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Politics of the Borderlands from Pre to Post-Commun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济在新时期获得的发展机会，甚至从更广的范围看，是现代化的一个结果。

一个类似的解释是，战前的民主实践时期的长度以及主导的政治设置使这些国家转化为不同的共产主义政体类型，包括科层制——威权政体、民族特色政体和世袭政体<sup>1</sup>。第一类是建立在工人阶级政党和已有的专业管理阶层基础上，导致了共产党内部人员在社会中的弱势，在共产党垮台的时候不能防止自己被替代。在光谱的另一头，建立在威权政体和非专业管理阶层基础上的世袭体制，给予共产党内部人士以特权，并允许他们掌控政治和经济权力。我们由此作出的一个预测是：在共产党统治前，民主和法制实践的时间越长，90年代共产党退出的可能性就越大。

最后，当时共产党退出最直接的原因，取决于共产党政权危机四伏时候的反对党的力量和活动。正如一些政治转型研究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反对派的力量（以及它内部的从温和派到激进派的组成结构）不仅影响它与政府谈判的可能性，也影响到谈判的结果<sup>2</sup>。反对派越强大，就越有可能使共产主义退出。相反地，诚如安德鲁·简诺斯所说，“因为它根植于共产主义和拜占庭传统的家长制，相比（苏联）西北部的崇尚法律合约的社会，共产主义与东正教传统的（苏联）东南部社会更契合”<sup>3</sup>。言外之意，是在我们观察的各类模式中，对共产主义的文化亲和性既可能推动反对派的兴起，也可能维持共产党的统治<sup>4</sup>。

尽管这些解释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原因，他们却面临着两个挑战。首先，许多解释往往依靠强大的相关性，而不是明确规定的机制，比如那些能使过去的遗产转化为数十年后的成果的机制。其次，这些原因往往定位于国家层次的变化：因此，他们无法简单地解释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区别、以及国家内部在对共产党的支持度上的差异性。这些对于国家建设和理论建设同样有趣和重要。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民主国家政府可以与次国家级的威权政体共存<sup>5</sup>，并在同一民族国家产生出非常不同的政治制度。

个体化解释还导致了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强调地理因素的解释的一个复杂之处，在于有些国家在政治上比他们的地理位置所显示的更亲西方：比如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比白俄罗斯更远离西方国家。地理因素也不能解释在争取“回归西方”上的差异。地理或文化亲和力如何转化为国内的政治行动？具体的区域和国际组织的一体化不能解释，因为直到共产党退出和民主化市场化开始很多年后，无论是欧盟和北约都没有吸收它们成为成员国这方面的前景<sup>6</sup>。在中东欧，即使是最热心的改革派谈到“回归欧洲”，也是指回到消除苏联干涉这样一种正常情况，而不是成为特定国际机构的成员国。此外，这些情绪并没有打破地理界线。因此，共产党在欧洲的塞尔维亚继续掌权，而欧洲以外的格鲁吉亚却迅速弃掉他们的共产党政权。渴望“加入西方”

<sup>1</sup> Herbert Kitschelt, Zdenka Mansfeldov(R), Radosaw Markowski, and Gabor Toka *Post-Communist Party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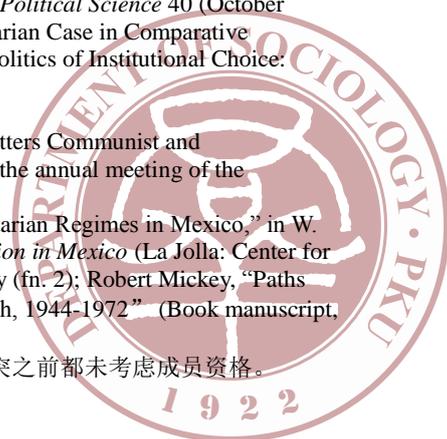
<sup>2</sup> 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Laszlo Bruszt and David Stark, "Remaking the Political Field in Hunga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6 (Summer 1992). For the negotiations, see Jon Elster, ed., *Round 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See also Pauline Jones Luo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Political Continuity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ohn Ishiyama, "Transitional Electoral Systems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2 (Spring 1997); Thomas Remington and Steven Smith, "Institutional Design, Uncertainty, and Path Dependency during Transi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 (October 1996); Patrick O'Neil, "Presidential Power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The Hungarian Ca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9 (September 1993); Timothy Frye, "A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oice: Post-communist Presidenc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0 (October 1997).

<sup>3</sup> Janos (fn. 9), 326.

<sup>4</sup> An excellent analysis of these arguments is in Grigore Pop-Eleches, "Which Past Matters: Communist and Pre-Communist Legacies and Post-Communist Regime Chan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4, 2005)

<sup>5</sup> Richard Snyder, "After the State Withdraws: Neoliberalism and Subnational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Mexico," in W. Cornelius, T. Eisenstadt, and J. Hindley, eds., *Subnation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Mexico* (La Jolla: Center for U.S.-Mex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99); Levitsky and Way (fn. 2); Robert Mickey, "Paths out of Dixie: The Democratization of Authoritarian Enclaves in America's Deep South, 1944-1972" (Book manuscript, Department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6).

<sup>6</sup> 于是，欧盟满足于与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定双边协议；直到1995年波斯尼亚冲突之前都未考虑成员资格。



或“回归欧洲”是一个基于地理上集群的重要的动机，但其根源不仅在于位置。因此，我们需要更好地考察“回归欧洲”愿望的深层机制。

前共产主义管理阶层的发展和政权类型如何转化为共产主义退出的机制，同样未能解释清楚。时空距离不应与因果上的相关程度混为一谈。比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专业管理人员阶层与共产党人士在共产主义垮台时期的软弱地位有什么因果关系？毫无疑问，中欧国家和很多中亚国家在前共产主义时期现代科层机构的发展水平和直接统治体制的不同，导致了共产主义时期和共产主义之后时期发展轨迹的不同。对于中亚国家，是苏联第一次将科层制带进了当地的游牧社会。不过，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这些差异会导致对共产主义政党的反对。事实上，人们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即好的科层制可以使共产主义体制更加合理、有效和有能力的，科层制遗产应该提高而非削弱共产主义的合法性。但是，良性的科层制遗产并不是一个唯一的必要条件，否则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就会还由共产党掌权。

把反共运动力量强弱作为解释的变量，既太过又不足。一方面，它确实与共产党的权力退出有很强的相关，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密切相关的。其次，如果我们认真考虑对因果关系中两者过于“同一”的警告，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在发生时间非常靠近的两个事件之间假设如此强的因果相关是否适宜。另一方面，这个解释需要我们确定“强大的反对力量”自身的决定因素：它们是什么，它们是否也可以解释共产党的退出？<sup>1</sup>

因此，共产党的权力退出需要另一种更好的替代性解释，它既能说明直接推动力，也能解释促进的条件。它也能提供一个分析的机制，解释共产党的权力退出何以是可行和可能的。如果我们转向前共产主义时代的历史，我们需要精确地指定，不管在集体还是个人层面，都有哪些因素和过程使一个社会的民众更不喜欢共产主义，更容易培育出权力更替型的新执政党。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邻居”本身，不大可能影响大众的反对情绪或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战前曾属于民主国家这一历史状况，是一个更可能的候选因素，因为这一历史很可能唤起非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回忆，把共产主义认定为反常的统治形式。最后，反共立场的发展自身也需要解释，因为它在分析上和经验上如此接近共产党的权力退出。

**反对派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它与民族主义思想的融合。**反对派运动自称要从一个外来强加的、非法的共产主义政权手中挽救国家。正如瓦莱丽班斯所说，“民族思想的扩散，扮演了反对派精英面对帝国统治时寻求缔造自己的国家和政权的机制”<sup>2</sup>。然而，如果民族主义驱动了反共产主义，那么我们需要问：为什么以及怎么样使各地区不同国家的大众情绪在态度上出现差异？以及其中链接这些历史上的信仰对当代事件产生影响的机制是什么？

虽然民族主义的发展与现代国家的很多传播工具相联系，**但传输“共享的国家认同和历史”的最有效的机制是教育**<sup>3</sup>。尽管由于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教育通常被看成是发展（城市化、工业化、收入增长）的一个部分，但教育的作用在因果逻辑上和经验上都是十分显著的<sup>4</sup>。学校教育提供了一套价值理念的、系统的灌输渠道<sup>5</sup>。大众扫盲教育最关键的就是它的时机：在第一轮的大众教育中（因为这个群体刚从口口相传的教育方式转变为文字教育）灌输给民众的民族国家的观念是持久的，第一代接受学校教育的人会以不同于之前或之后的同龄群体的方式传递这些观念。因此，我们关注那些不仅早于共产主义、也在一些情况下早于民族国家的历史遗产。这些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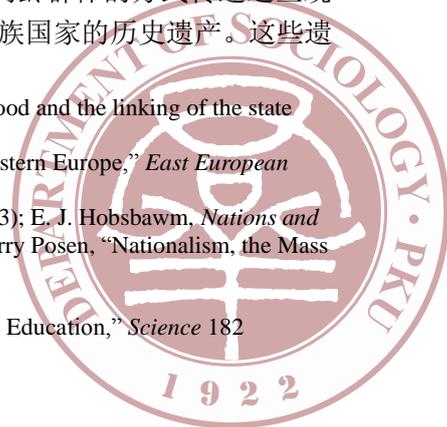
<sup>1</sup> Bunce (fn. 1) and Janos (fn. 12) identified the rise of the opposition with prior statehood and the linking of the state project with liberalism.

<sup>2</sup> Bunce, “The National Idea: Imperial Legacies and Post-Communist Pathways in Eastern Europ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19 (Summer 2005).

<sup>3</sup>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E.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 3; Barry Posen, “Nationalism, the Mass Army and Military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 (Autumn 1993).

<sup>4</sup> Deutsch (fn. 8); Lipset (fn. 8); Inkeles (fn. 8); Lerner (fn. 8).

<sup>5</sup> Sylvia Scribner and Michael Cole,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Formal and Informal Education,” *Science* 182 (November 9, 19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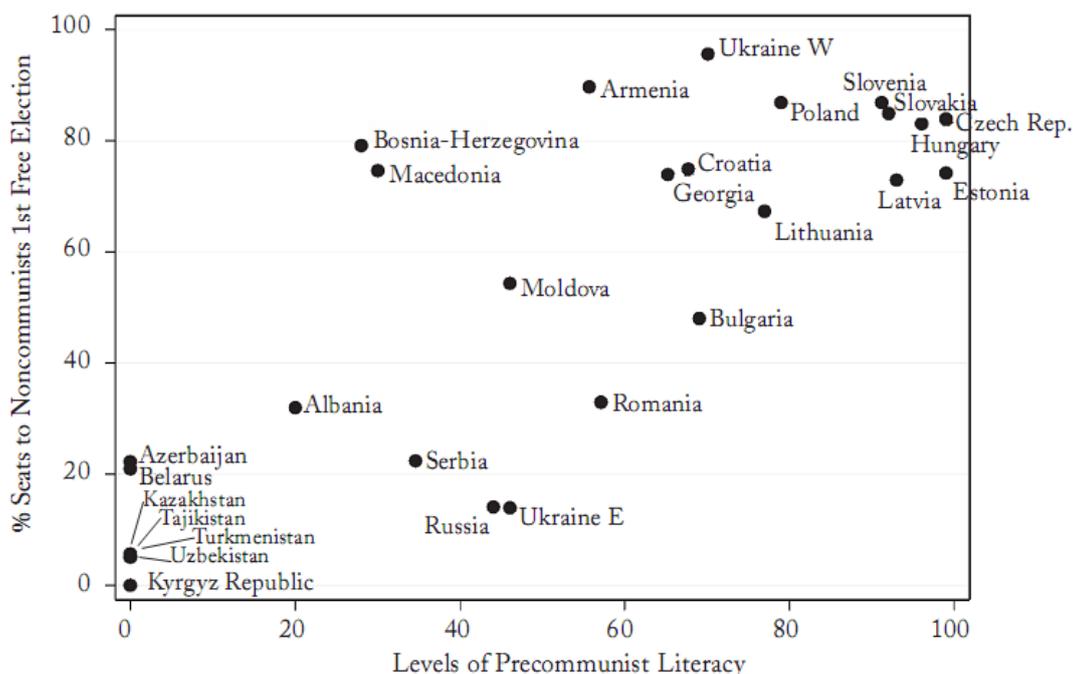


产包括大众教育的时机和它的民族教育的实质内容。如果没有大众对政权的反对，共产党的权力退出就不会发生。反过来，这种民众反对也正是基于建国要求、统治合法性等观念上的，而这些观念最初都是由教育灌输的。在非共产主义政权下实现的对大众的文化教育，导致了一个不认可甚至经常直接反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民族国家认同。前共产主义时期的教育降低了对共产党的支持程度，并增加了普遍反对共产党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推测共产党的权力退出更可能发生在共产党统治前就已经普及了教育的地方<sup>1</sup>。

该地区的大众文化教育的内容和程度见附录 1。要建立基本的相关关系，并测试竞争性假设，我们转向直截了当的统计分析来比较前共产主义时期的教育对共产党退出的影响，并考虑经济发展、前共产主义时期的实行民主制度的年数和区域影响，比如距西方的距离（完整的操作化和这些变量的编码见附录 2）。

研究结果支持这种说法，即如果学校教育在共产主义时期之前就已牢固建立，并且民族文化得以广泛传播，那么在第一次自由投票中，大众更可能赞成共产党退出执政地位。正如由简单散点图（图 1）所示，共产党执政前人口受教育比例与共产党在第一次选举中落败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sup>2</sup>。在共产主义时代前就有较高受教育率的所有国家中，共产党在第一次自由选举中彻底失败。

图 1. 前共产主义时代的学校教育与第一次自由选举中非共产主义政党夺得的席位



为了对我们的假设进行一些基本的统计测试，我们选择了一个简单的横截面 OLS 回归作为我们的估计程序，并将其应用到共产主义之后的时期的情况。<sup>3</sup>表 1 中的调查结果证实了从散点

<sup>1</sup> Keith Darden, “Mass School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Enduring National Loyalties” (Boo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Yale University, 2007).

<sup>2</sup> Only Macedonia and Bosnia-Herzegovina, both with low levels of education prior to 1945, diverge from this general pattern. These two cases will require further research; given the high level of decentralization in the Yugoslav school system, we currently lack sufficient data on the content of schooling in these provinces under communism.

<sup>3</sup> With one notable exception, Ukraine, our units were the current countries and the historical data are for the population that lived within the current boundaries. Given th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ontent and extent of schooling prior to communism, we created two units out of Ukraine, one for the three provinces that made up Austrian

图就能显而易见看出的结论：共产党执政前的教育状况单独可以解释超过 80%的变异（模型 1）。

一旦我们把共产主义之前的文化教育水平包含进来，城市化的影响就被消掉了（见模型 2）。与现代化理论相反，我们发现，“一切美好的东西”并不统一：学校教育的影响，既与战前的民主国家地位无关，也与城市化水平（共产主义之前的国家工业化水平的表现）无关。<sup>1</sup> 识字率解释掉了共产主义之前国家地位的影响和民族团结的优势，这种可能性已经被模型 3 证伪了，而模型 3 控制了建国前的年数。这些变量的加入，不管是单独或一起，没有增加该模型的拟合，也没有改变前共产主义的识字率水平对解释的首要地位。最后，与结构因素相反，不管是东中欧的仿制品（这可以解释在苏联以外的影响），或是到西方的首都的距离，一旦和前共产主义的识字率一起包含进方程式，都不能解释其中任何的变异（见模型 4 和模型 5）。

所有这些结果对于把共产党的退出不管是定义成反对派得到的支持票数还是非共产主义政党获得的席位都是显著的。由于该地区没有可靠的可比较的对历史上财富的测量，我们没有使用历史上的 GDP 作为对前共产主义的现代化水平的代表。<sup>2</sup>相反，我们使用了几种其他代表特征：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人均的医生数，铁路密度（领土内每平方公里的铁路里程）。无论是单独或与其他变量组合，这些都不具有实质上或统计上的显著性。结果证实了我们最初的发现，即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指标并不会削弱前共产主义时期的识字率的主导性影响。<sup>3</sup>

表 1. 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第一次自由选举中非共产主义政党夺得的席位  
(OLS 回归, 标准误差, 50 次重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前共产主义社会识字率	.849*** (.087)	.960*** (.107)	.826*** (.156)	.777*** (.211)	.669** (.243)
前共产主义社会城市化水平		-.761 (.432)	-.614 (.458)	-.439 (.527)	-.457 (.398)
之前实行民主制的年数			.882 (.980)	.769 (.834)	.721 (.996)
中东欧傀儡政权				6.29 (9.27)	
与西方国家的距离					-.007 (.0066)
常数	5.65 (7.10)	13.91 (9.64)	13.92 (10.95)	10.89 (9.26)	27.14 (18.40)
N	28	28	28	28	28
修正的判定系数	.60	.62	.62	.63	.64

\*\*\* (P>|z|) = .000; \*\* (P>|z|)  $\delta$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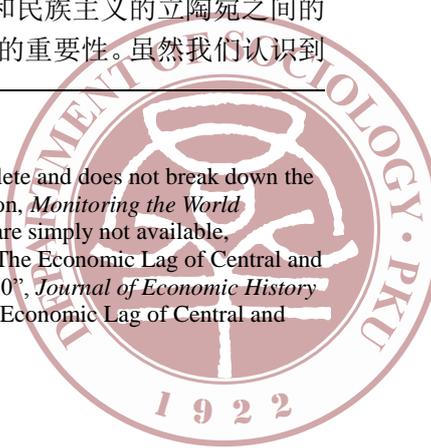
总之，结构/地缘政治因素和共产主义时代之前的遗产（包括现代化）对共产党的退出的解释力小于大众文化教育。这表明，我们可能会捕捉到了许多学者归为“地区影响”或者“苏联遗产”的未被测量的文化差异。在更微观层面的比较上，之前的民族教育作为“区域效应”的来源被进一步证实了。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区域差异证实了这一结论。例如，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利沃夫和它的赞成共产主义的邻居扎卡帕特斯卡，西方的共产主义白俄罗斯和民族主义的立陶宛之间的差异显示了前共产主义时期的文化差异对于共产主义时期之后的轨迹的重要性。虽然我们认识到

Galicia and another for the remaining provinces. 乌克兰是一个明显的意外。

<sup>1</sup> Janos (fn. 12).

<sup>2</sup> The widely used historical GDP data set by Angus Maddison is unfortunately incomplete and does not break down the data for the republics in the Soviet, Yugoslav, and Czechoslovak federations; Maddison,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 C199*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1995). Much of these data are simply not available,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under Soviet control, such as Central Asia. See David Good, “The Economic Lag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come Estimates for the Habsburg Successor States, 1870 (R) C191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4 (December 1994); and Michael Pammer, “Proxy Data and Income Estimates: The Economic Lag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7 (June 1997).

<sup>3</sup> 如需要，可向作者索要所有的结果和数据。



并承认横剖的国家层面的小观察量的数据分析可能具有的问题，这些研究结果与我们的假设——即共产主义时期前的学校教育与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潮之间是相关——是相一致的。此外，这项分析表明尽管现代化本应该用更多的世俗利益代替了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仍然是共产主义失败背后的驱动力。

此外，对内生性（对共产主义时期后的数据进行横截面收益检验的一个问题）的担忧可以减轻，因为主要变量——共产主义时期前的教育和共产主义时期后的选举结果——到目前为止是独立的。对于在这个区域内从共产主义建立到垮台这样的根本性变化，一个共产主义时期前的变量能对共产主义时期后的结果产生这么大的解释力，这需要更好的解释。

### 三、大众教育和共产党退出的关系

那么，什么是大众教育的模式？为了衡量大众的接受教育程度，我们首要测量的是在学校接受教育的程度，因为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之交，几乎所有的教育活动都是在学校进行的。通常，一个有文化的公民至少用 4 年时间在学校接触标准的历史、文学、地理、音乐课程，形成共同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忠诚。相反，未接受过教育的农民或牧民则分裂成“当地风俗和关系、节日和民间传说的孤岛，因为方言、传统以及口语交际所不可避免的规模上的限制，导致与社会其他部分分离。”<sup>1</sup>识字率因此标志着学校教育的程度和高水平文明的程度。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成为大规模共享的共有的文化。

关于共产主义时期之前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后共产主义时代国家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在共产主义到来前，大众受教育水平高，学校课程中含有实质的民族主义内容：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波兰，立陶宛，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和乌克兰西部的加利西亚地区。在进入共产党统治前，这些国家/地区都取得了超过 70% 的教育普及率。这些地区中，大部分已经持续普及了几代人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建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比率通常较高。

在这些国家，共产主义时期前的教育中灌输了民族主义的内容<sup>2</sup>。在哈布斯堡王朝各省份（后来成为匈牙利，捷克，波兰，克罗地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加利西亚），这种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哈布斯堡王朝“分而治之”政策的遗产，它制造出民族之间的相互对立以防止各族联合起来挑战王朝君主政体<sup>3</sup>。19 世纪，维也纳采用学校课程以培育加利西亚的新的“乌克兰人”的身份，以对付波兰活跃的民族主义和俄罗斯潜在的民族统一主义，也同样协助了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的民族主义的发展从而减弱匈牙利贵族日益增大的影响（作为回应，匈牙利培育“塞尔维亚”认同去制造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分裂）<sup>4</sup>。随后，

<sup>1</sup> James Sheehan, "What Is German History?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the Nation in Germ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3 (March 1981), 8.

<sup>2</sup> 要想了解在民族联盟资助下的当代对这些情况的概述研究，请参照 Jonathan French Scott, *The Menace of Nationalism in Education* (London: G. Allen and Unwin, 1926)。对历史发展的全面介绍和社会科学对教育的研究在当时深受民族和种族的影响，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研究，请参照 Aaron Benavot, Yun-Kying Cha, David Kamens, John W. Meyer, and Suk-Ying Yong, "Knowledge for the Masses: World Models and National Curricula, 1920-198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February 1991)。

<sup>3</sup> 弗朗茨二世曾说：“我的子民彼此之间陌生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此，他们不会同时患上相同的病症。在法国，当热病来临时，所有人一天之内都患病了。我将匈牙利人置于意大利人中间，将意大利人置于匈牙利人中间。邻居之间互相打量，却不能互相理解，从而相互憎恶。因为他们相互反感，秩序得以建立；因为他们相互仇恨，和平得以保证”。参见 Sarah E. Simons, "Social Assimi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 (May 1901), 814.

<sup>4</sup> Robert A. Kann, *The Multinational Empire: Nationalism and Reform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1848-1918*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0); Charles Jelavich, *South Slav Nationalism: Textbooks and Yugoslav Union before 1914*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18 (R) C20; Paul Robert Magocsi, *A History of Ukrain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407 (R) C15.



哈布斯堡王朝将学校教材内容上的控制权逐步下放，这为新的民族主义精英创造了机会，尤其是在匈牙利、捷克和波兰，为他们建立独立国家的诉求提供了认同意识方面的支持。即使是这些国家中教育普及率最低的克罗地亚，1910年的识字率就超过了50%，而其教育体系中则包含有大量民族主义内容。因此，即使在帝国统治下，课程内容也有民族主义的内容，并且强调培育彼此不同的认同意识。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政府和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利用民族主义的学校课程来建立对新国家的忠诚和领土要求的合法性。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罗的海三国，以及波兰（直到1930年）创建了集中和标准的学校课程，对教师的培训也强烈关注如何使大众同质化且具有“民族国家”意识。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区，绝大多数学校都在努力培育对各自省份民族主义身份的认同：学校教育是分散的，课程内容往往是在学校层面决定的。<sup>1</sup>

在其他一些地方，那时尚没有带有连续性的教育政策来灌输与民族主义有关的内容。例如在外加法利亚，直到1938年这个省被匈牙利占领之前，俄罗斯贵族、亲俄的知识分子以及相邻的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各自仅仅提供了十分有限的民族主义教育<sup>2</sup>。南斯拉夫的统的教育资源是如此贫乏，以至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仍然沿用之前的教师、课程和教材<sup>3</sup>。这意味着，那些相对拥有雄厚学校体制和教育历史的地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伏伊伏丁）通常保留了他们的文化普及水平<sup>4</sup>。而在那些教育程度较低的地区，结果显示对农民进行教育的明确目的只是要确保培养忠诚的官僚，忠于国家的战士和忠诚的公民<sup>5</sup>。

在光谱的另一端座落着第二群国家，它们在共产主义时代前几乎没有文字文明。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前苏联的5个中亚加盟共和国、波斯尼亚-黑塞哥尼亚和马其顿在共产党夺得政权的时候，识字率都没有超过30%。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这些地区几乎没有学校教育，文化也是破碎的不均匀的，认同意识是地方性的，政治忠诚是传统型的<sup>6</sup>。那些少量受过教育的公民，要么属于其他民族，要么是国家官员。在阿塞拜疆和中亚，会读写的人一般都是俄罗斯人或者其他民族的人。1920年在苏联开始扫盲运动并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在这些地区的非斯拉夫人口中，除了乌兹别克人，其他的连5%的识字率都没有达到。在沙皇俄国，阿塞拜疆和中亚的有限的学校里也几乎都是用俄语教学，那时便宜的大众读物全都是俄罗斯中心主义的。这些地区的学校和教育完全缺乏民族主义的内容，不能把区域文化与合法统治权和独立权利相联系<sup>7</sup>。直到1909年，阿尔巴尼亚没有一所培训教师的学校，阿尔巴尼亚语也没有标准字母表<sup>8</sup>。甚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也只达到20%的识字率，这些教育还是通过宗教行为达到的。这些地区最后实现的学校教育就处于共产主义控制之下。其他地区关于大众教育的情况，则是要么处于正在建立的过程中，要么国内地区差异很大。比如说罗马尼亚，1930年的识字率是57.1%，在特兰西瓦尼亚几乎全民普及教育而且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味道，但在比萨拉比亚只有38%的人有读写能力<sup>9</sup>。

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两战中的摩尔多瓦都达到了适度的识字率，大多数省份的年青

<sup>1</sup> Magocsi (fn. 30), 168.

<sup>2</sup> Ibid., 177.

<sup>3</sup> Jelavich (fn. 30)

<sup>4</sup> 事实上，南斯拉夫识字率的微小进步可能归因于未接受过教育的老一辈人的过世，而不是任何教育上的显著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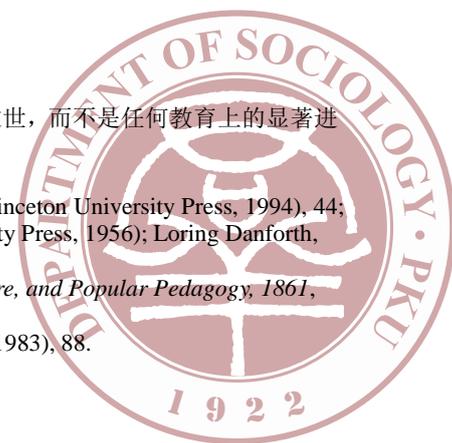
<sup>5</sup> Hobsbawm (fn. 18), chap. 3; Posen (fn. 18).

<sup>6</sup> Robert J. Kaiser, *The Geography of Nationalism in Russia and USS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44; Nicholas Vakar, *Belorus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Loring Danforth, *The Macedonian Conflic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sup>7</sup> Kaiser (fn. 36), 67; Ben Eklof, *Russian Peasant Schools: Officialdom, Village Culture, and Popular Pedagogy, 1861, C19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sup>8</sup> Barbara Jelavich, *History of the Balk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88.

<sup>9</sup> Jelavich (fn. 30), 16.



一代都普及了学校教育<sup>1</sup>。但是这些人被灌输的，是他们都“属于大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共享基辅罗斯公国的文化”的意识<sup>2</sup>。于是，尽管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各斯拉夫群体已经取得一定程度的教育普及率，但学校教育使用俄罗斯语，强调大俄罗斯民族的正统统一。

对于那些大众教育已经起步但还没有普及读写能力的地区，最有趣的就是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尽管学校教育主要是在苏联统治下开展起来的，教育内容还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形成了单独的外高加索独立联盟。在这段时间，两个共和国都建立了民族主义的小学教育系统，包括了民族主义的教材和教师培训<sup>3</sup>。苏联政府炫耀说正是苏联权力加强了在前共产主义社会就已经开始的“民族工作”<sup>4</sup>。传统的教师队伍和教学课程被保留下来，到1933年实行大撤退政策以及1937年大清洗的时候，这些地区的人口已经在民族主义的课程中接受了教育<sup>5</sup>。根据1939年人口普查，尽管格鲁吉亚族人在总人口中只占61.4%，格鲁吉亚族人构成该共和国教师的72.2%，教授和学者的73.6%<sup>6</sup>。同样，亚美尼亚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82.8%，但是该族人在教师和教授学者中所占的比例为84.2%和88.5%<sup>7</sup>。

然而比这些知识分子在总人口中的净比重更重要的是，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与前苏联其他地方在二战前所受的教育都不一样。结果，尽管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在加入苏联时只有50%的识字率，但这两个国家在1930年代仍然保留了它们在此之前的民族主义教育课程和教师队伍，这段时间两个国家的全体人口几乎都接受了学校教育。

#### 四、从学校教育到反共产主义

将大众教育和具有更广泛基础的民族主义相连接的机制有三个。首先，学校提高了大众识字率。识字能力意味着对于观念在时空中的传播，面对面的口头交流不再是必须的传播途径。它同样急剧地增加了一个社会回忆和传播历史、文化和神话的能力<sup>8</sup>。书刊所能包容的信息量远远大于人们的记忆。大众识字能力的普及使得陌生人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sup>9</sup>。学校教育于是增加了一个社会通过大众传播来复制和维持民族主义信念的承载能力。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大众教育通过课程设置强化了民族主义信念。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大多数学校在文学、历史、地理和音乐课程中都安排进了民族主义的内容，因而将爱国主义思想灌输给青少年。结果，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民族主义的上升与对年轻人的教育和社会化直接相关，也与同时发生的学校课程当中对民族主义内容的介绍有关。在大众教育发展之前，教育和社会化是让儿童学习礼仪、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技能和对他们的父母和长辈的尊敬<sup>10</sup>。这种非正式教育的形式是保守的，文化主要靠观察或在实践经验中习得或模仿。然而，民族主义作为新奇的概

<sup>1</sup> Jews, who were nearly all annihilated on the territory of Ukraine and Belaru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us could have little effect on post communist trajectories, would have inflated the pre communist literacy statistics of these regions somewhat.

<sup>2</sup> Eklof (fn. 37)

<sup>3</sup> On Georgia, see Wladimir Woytinsky, *La Democratie georgien* (Paris: Librairie Alcan L(R) Pvy, 1921), 266(R) C70; and Karl Kautsky, *Georgia: A Social-Democratic Peasant Republic*, trans. H. J. Stenning (London: International Bookshops, 1921).

<sup>4</sup> Terry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Ithaca, N.Y.: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15.

<sup>5</sup> It was a purge that, in Georgia, largely targeted teachers and the intelligentsia. Tamara Dragadze, *Rural Families in Soviet Georgia*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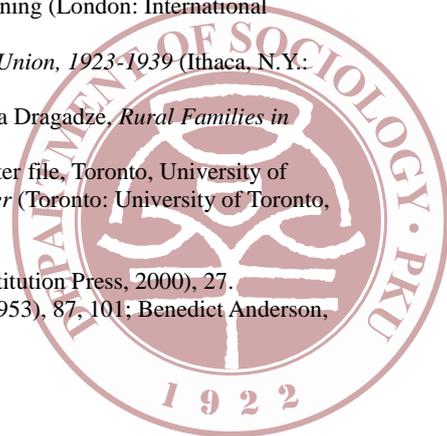
<sup>6</sup> USSR Census of 1939: Aggregate Statistics from the USSR Census of 1939 (Computer fil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Centre for Research in East European Studies), Robert E. Johnson, *Producer*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Data Library Service [distributor], 1995), table 63b.

<sup>7</sup> *Ibid.*, table 66b.

<sup>8</sup> Jack Goody, *The Power of the Written Tradition*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2000), 27.

<sup>9</sup> Karl W.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53), 87, 101;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New York: Verso, 1991), 44 (R) C46.

<sup>10</sup> Scribner and Cole (fn. 20), 554-55



念是不可能通过这种传统的方式传播的<sup>1</sup>。但是，民族主义却可以在学校里学到。用学习课本来代替在实践中观察，儿童学会了用普遍化的概念而不是基于实践的概念分类来理解世界<sup>2</sup>。

第三，这些教学内容是由广泛的国家机构来提供和监督的，以便使年青一代学习得到完全同样的一套理念<sup>3</sup>。在每个社会都设置了界限分明严格控制的一套体系，绝大多数青少年都会在学校中度过多年时间，教育工作者严格控制这套体系中的观念传播<sup>4</sup>。同样，这些教育工作者也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并在中央机构中接受标准化的教育培训。

总而言之，学校教育解释了民族主义观念来源这一关键因素。学校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性机构向社会大众传播简要的共享的信念，比如共同的民族意识。而这些大众之间本身没有什么机会相互沟通，正式教育能够做到这点，首先因为它用普遍的文字和学校教材的教育，替代了口头的非正式的社会化，其次因为它在学校课程中介绍了民族主义相关的内容，最后它还依靠老师和标准的国家机构来扩散民族文化。

第一代接受学校教育的人至关重要，因为这一代的教育能抵消那些曾经灌输给民众的不同的民族国家观念，比如共产主义教育所倡导的“国家”概念。而民族国家概念一旦建立起来，那么不管国界如何变化、战争破坏乃至人口迁移，这些观念都会维持。于是，居住在波兰或者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认为他们自己是与当地其他居民不同的“德国人”。被迫迁移到苏联的波兰人以及“伏尔加德国人”也依然保持了他们自身的认同<sup>5</sup>。

结果，最初通过学校传播的“民族”观念最后慢慢融入到大众文化中，最终被看成是普遍真理。不同于之前的宗教传播体系（如受到与尘世隔绝知识培训的精英组成的教会组织），学校教育直接将信仰带进千家万户，每个上学的小孩都能复述国家的历史，都会唱国歌，背诵民族的诗歌，知道国家重大节日的意义。在文化已经普及的社会，特别适合开展地下颠覆活动，严酷政治环境更使这些活动具有团结和不屈不挠的特征<sup>6</sup>。在诸如战争、种族灭绝和人口迁移这样的在二战中常见的剧变中，这些认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民族认同被灌输到家庭中，即使被迁移到数百里以外，这些认同也通过家庭得以留存（讽刺的是，在二战后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人口在族群同质性方面的增长同样意味着在人们政治意识的同质性在增加）。

这里有几点值得警惕。首先，大众教育和识字能力并非民族主义信念传播的必要条件，民族主义也可以通过教会神职人员和其他大众口头交流方式得以传播，尽管可能没有那么有效和不可逆。第二，学校教育制度本身不能构成煽动民族主义的充分条件；它需要在教育内容中包含有民族主义。十九世纪学校教育新增的诸如地理和历史这样的科目能够很好地传播民族和民族主义观念。新教和天主教改革者更早就利用学校来控制了儿童的思想，但是这样的学校教育导致的是

<sup>1</sup> 有经验证据支持在学校教育和非来源于实践的抽样概念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参加 A. R. Luria 对这些实验的讨论，“Towards the Problem of the Historical Nature of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6, no. 4 (1971); idem, *Cognitive Development: Its Cultural and Social Found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Scribner and Cole (fn. 20); and especially idem, *The Psychology of Lite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由于最有说服力的实验来自 Scribner and Cole (pp. 130-133)，以利比里亚为对象，所以这种向抽象的转换适用于西方的教育模式（课程内容），而适用于识字率的发展或是伊斯兰的典型语言文字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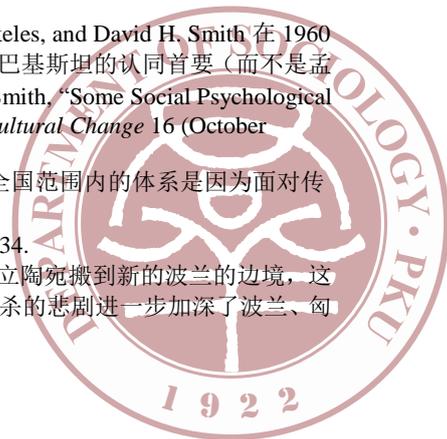
<sup>2</sup> 在仅有几个系统测量学校教育和民族主义的尝试中，Howard Schuman, Alex Inkeles, and David H. Smith 在 1960 年的研究发现，即使控制了城市化和职业等因素变量，识字率依然对受访者对巴基斯坦的认同首要（而不是孟加拉或者他们的地区身份）有重大的实质性影响，参见 Schuman, Inkeles, and Smith, “Some Social Psychological Effects and Noneffects of Literacy in a New N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6 (October 1967).

<sup>3</sup> 这个典型是普鲁士 1808 年采用的教育体系，在东欧和西欧被广泛仿制。建立全国范围内的体系是因为面对传统失落时，需要重建共享的对国家合法权力的认识。

<sup>4</sup> 关于现代学校教育金字塔体系对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参见 Gellner (fn. 18), 34.

<sup>5</sup> 战后民主转型对民族情绪几乎没有影响。德国人回到德国，波兰人从乌克兰和立陶宛搬到新的波兰的边境，这种强制的移民没有在新建立的民族社区中插入不同的方言或者民族认同。大屠杀的悲剧进一步加深了波兰、匈牙利和其他国家内部同质性。

<sup>6</sup> Gellner (fn. 18), 32.



对宗教教义的强烈附着，而不是不同的民族国家认同<sup>1</sup>。直到 19 世纪，学校课程中才开始包含民族主义教育内容，民族主义和学校教育才具有因果关系。在那个时候，识字能力才在东欧广泛传播，而部分东欧地区加入了苏联。于是，在这里检验的前共产主义社会中，出现了民族主义伴随着学校教育的增长。

### 从民族到价值观

共享的民族认同提供了合法统治权的标准。民族观念推进关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贡献观念，统治合法性意味着要与民族观念相符。首先，共产主义是本土发展出来的还是占领军强加的？其次，它的发起人苏联在历史上是敌人还是友好的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共产主义是代表着本民族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进步，还是反现代化的历史倒退？换句话说，共产主义与民族在宗教、文化和经济上的期望是否一致？

在共产党统治前就存在着民族主义教育的地方，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共产党政权被认为是受到地域强权控制的外来的低人一等的政权。这并不是说建立共产党统治时，一些地方精英不是起到核心作用的热心的共产主义者，也不是说社会主义价值观——如有保障的就业、社会保障和平等主义——被拒绝。但是纵观历史因素和地区民意显示，共产党政权并不被认为是合法的。共产主义政党在建立统治时，要与大众抵触相抗争，政权建立后又要与大众的冷漠相抗争，当时大多数人对前共产主义社会都充满怀旧之情<sup>2</sup>。

于是，在二战之后，共产党在自由选举中仅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了胜利，那里在战前就有浓厚的社会主义传统<sup>3</sup>。这个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共产主义的诉求在表述上存在节制，并且民众对刚刚重新收复的苏台德地区的地位不是很确定<sup>4</sup>。一旦共产党加强权力，他们就开始遭到批评和反抗。1946 年，共产党在斯洛伐克大幅度输掉了选举。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政权是在苏联坦克的护卫下建立的，得到苏联和它的占领军的明确支持，从来没有得到选举支持。即使在号称共产主义是本土培育出来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也没有确保得到支持<sup>5</sup>。

俄罗斯以及接下来的苏联，被看成民族和民族价值观的敌人。这种观念既起源于战时被苏联占领的经历（对于波兰，还有在希特勒入侵时苏联拒绝提供反法西斯援助），也起源于战前对历史的教导。保加利亚<sup>6</sup>和塞尔维亚<sup>7</sup>在某种程度上是例外，因为它们的民族教育同样包含亲俄和亲苏联的内容，这可能与俄罗斯把它们从奥斯曼帝国手中解放出来有关。

对于那些在战争期间曾经品尝过独立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好处的国家，共产主义意味着对现代化和民族价值观的倒退。共产主义是世俗的，而波兰、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的民族观念往往与天主教教会<sup>8</sup>密切相关。共产主义名义上是反对民族主义、主张四海一家的，而当时地区性民族情感是紧张的。最后，它推行计划经济的生产而不顾各地的比较优势，从而导致生活水

<sup>1</sup> C. John Sommerville, *The Discovery of Childhood in Puritan England*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2), chap. 9.

<sup>2</sup> See the chapter by Bela Zhelitski, John Micgiel, and Inessa Iazhborovskaia, in Norman Naimark and Leonid Gibianskii, ed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 1944-1949*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 The few reliable communist-era public opinion polls tended to show a support for socialist values without support for the regime itself (in Poland, for example, roughly 70 percent of the students polled supported socialist values but rejected Marxism). In both the Czech Republic and Poland, these polls also show interest and glorification of the prewar era. Walter D. Connor and Zvi Gitelman, *Public Opinion in European Socialist Systems* (New York: Praeger, 1977), 45-178

<sup>3</sup> 共产党在捷克的选举中获得 38% 的支持，但远远少于斯洛伐克的支持率。

<sup>4</sup> 红军和苏联被看成是苏台德地区的主要保障。

<sup>5</sup> 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胜利依赖于苏联军队的存在，以及他们在 1945 年进入贝尔格莱德来保证共产主义的秩序。

<sup>6</sup> 保加利亚对俄罗斯敌意较小，因为 1905 年保加利亚革命时，俄罗斯从奥斯曼帝国手中解放了保加利亚。

<sup>7</sup> 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和俄罗斯东正教有亲缘关系。

<sup>8</sup>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波兰的黑麦当娜，这既是一个宗教的崇拜对象，也是神保护波兰的象征（她被认为激起人们抵挡 17 世纪的瑞典入侵和保佑 1920 年布尔什维克战争的胜利。）



准和国民生产总值低于战前水平。在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的小资产阶级看来，财产国有化和国家经济政策依附苏联，对于本国经济是一场灾难<sup>1</sup>。

这些对于统治合法性的标准来源于一套共享的期望：即谁最能有助于实现民族利益？什么组成了文化、经济产品、公民权利和政治代表性这些政府应该为公民提供的东西？这些标准的存在从而导致了与共产主义时代的对比：一是与非共产主义邻国相比，二是与假想中如果没有出现共产主义统治的情况对比。结果，当中亚各共和国看到了在妇女权利、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国家基础设施上的巨大进步时，许多东欧国家看到的却是压迫、经济停滞、市场国有化和国家的发展迟缓。对于波兰，参照物是战前的情况，在所有方面——从建筑、童子军到成果保护——都没有出色之处。在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波兰，学者计算成为苏联集团成员以及被迫与苏联集团进行不利交易的经济代价，而他们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行们则计算着自主的南斯拉夫的代价。尽管在共产主义统治下这些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取得进步，但相对收入并没有增加。在1930年，东中欧的人均收入是西欧的37%，这个比例在1970年和1980年小幅度降到了35%<sup>2</sup>。即使在斯洛伐克和乌克兰西部这样的物质水平提高的地区，反共情绪也一直持续。

与此同时，正如邦斯、卡普斯特和瑞利所指出的那样，地理接近性意味着与邻国的持续和令人悲伤的对比。对于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匈牙利人，与奥地利的接近（以及他们共享的历史）正是自己国家可以计算和比较的基准，而他们战后的经济发展被视为不合格。边境地区被奥地利和德国的媒体所覆盖，传播内容引起的对比更彰显出社会主义体系的弱点。对于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芬兰是比较的参照物。罗马尼亚知识分子以法国为参照物。而波兰的不同政见者将斯堪的纳维亚的模式看成可替代的选择<sup>3</sup>。结果，即使共产主义在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中提供了一些积极的结果，尤其在农村发展方面，这些成就在与假象的非共产主义状态和西方社会的状况进行比较中被打折了折扣。正如观察者所指出的，流行的社会心态是：“要不是因为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就和西方一样了”<sup>4</sup>。

在前苏联那些普及大众教育的加盟共和国，也有同样的情况。在格鲁吉亚<sup>5</sup>，共产主义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1921年吞并外高加索地区和1924年镇压格鲁吉亚运动时通过暴力强加的<sup>6</sup>。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苏联的高层领导人（包括斯大林）认识到格鲁吉亚人拒绝接受苏联共产主义的统治，尤其在西格鲁吉亚。1970年代阿巴瑞和里克尔提的一个民族志研究的细节发现了即使农村居民也将前共产主义社会浪漫化，在家里给孩子讲授前共产主义社会的民族神话故事，把俄罗斯和苏联文化看成是低等的。亚美尼亚相对比较亲俄，因为在他们的神话故事中，俄罗斯人被描述为帮助过他们从压迫者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来。

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及乌克兰地区，他们加入苏联之前就存在民族主义教育，因此反俄情绪经久不衰。尽管苏联把工业化和电力带入了农村地区，共产主义却从来未能得到广泛支持。事实上，它被看成对该地区的更有前途的欧洲特征的损害。尽管任何公开表达反共情绪都会被严酷镇压，民族主义思想还是通过地下出版物得以传播。在乌克兰，1960年代和1970年代<sup>7</sup>这些地区逮捕了70个持不同政见的民族主义者。在格鲁吉亚，与苏联官方生活平行的是地下的反共文化，包括历史、文学作品和歌曲。重大的宗教和民族节日被秘密庆祝，地下文化通过家庭朋友的私下聚会而传递。共产主义被认为是俄罗斯（乌克兰认为是莫斯科）强加的，苏联在

<sup>1</sup> 例如，匈牙利在战后经历的通货膨胀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同样的，捷克的工业计划失败也主要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实现工业化了，几乎没有自然资源，所以主要依靠与德国等的自然资源。

<sup>2</sup> Figures calculated from Janos (fn. 12), 3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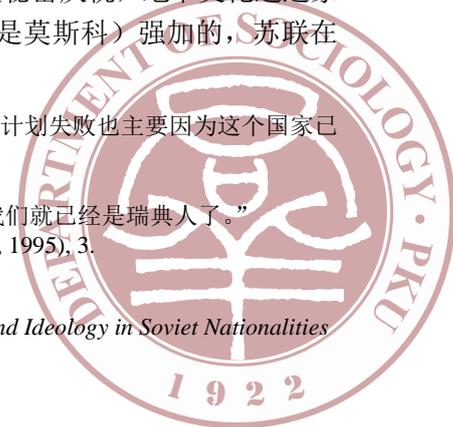
<sup>3</sup> 正如1970年代流行的笑话，“为什么黑麦当娜要去击退瑞典人的入侵？不然我们就已经是瑞典人了。”

<sup>4</sup> Adam Przeworski, *Sustainable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3.

<sup>5</sup> Tamara Dragadze, *Rural Families in Soviet Georgia*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sup>6</sup> Ibid., 183-8

<sup>7</sup> Kenneth C. Farmer, *Ukrainian Nationalism in the Post-Stalin Era: Myth, Symbols and Ideology in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y*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1980), 176-79



1939年和1944年令人恐怖的吞并被不断描述以说明俄罗斯民族的本质。当地上的共产主义者被看成是占领者的帮凶，只有反共的行动才被看成是爱国的和忠诚的。

与此相反，在中亚和阿塞拜疆，与苏联时代之前和与非共产主义邻国的比较是令人愉快的。与苏联紧密相关的共产主义被认为是启蒙和进步而不是强加的。共产主义给这个地区带来了电气化、工业化、学校教育、高层次的文明以及现代生活的各种形式。它尤其代表了将妇女从传统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在中亚，主要的认同是与共产主义时代的行政单位（州）相联系的，而不是与宗族、部落或者任何或真实或想象中的前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体<sup>1</sup>。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大众眼中的前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很大程度上还是像苏联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冷漠、愚昧和贫穷的世界<sup>2</sup>。尽管莫斯科的一些具体政策会遭到批判，但对苏联统治的总体评价是苏联给中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俄罗斯及它的文化对这片地区的影响被认为是正面的<sup>3</sup>。

对于中亚国家，与邻国的对比加强了它们对共产主义影响的正面评价。今天，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仍然代表着没有共产主义统治的负面样板。塔利班政权下的阿富汗代表着苏联所形容的前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只有邻国中国得到赞许，但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中国榜样只能加强把共产主义看成是启蒙和现代化力量的想法<sup>4</sup>。事实上，人们假设的是实际上没有走的那条道路，即如果苏联没有结束共产主义时代，生活会是什么样的<sup>5</sup>。

在由苏联政府推广学校教育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地区，就像中亚一样，亲俄情绪始终占主导地位。与苏联的意识形态相一致，认为共产主义与科学技术、工业化和进步相联系。即使在集体化时代受饥荒影响最严重的乌克兰地区，共产主义还是被看作普及了农业机械化、识字能力的进步力量。一些调查也确实显示出，这些地区最坚定地亲俄并且最怀念苏联体系。共产主义也被看成是这些地区内生的运动，它们拥有本土的、爱国的共产主义英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拥有彼此不同的认同和文化，但文化被看成是相近、相同的或者隶属于大俄罗斯共同体的。苏联卫国战争中的集体努力被看成是当地人民最伟大的爱国成就，尤其是在白俄罗斯。共产党的游击队和红军被看做祖国的保卫者而不是占领军。

### 从比较到反对

这些广泛的比较，意味着反共的民族主义精英能够在大众中找到不同程度的共鸣。横穿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都有精英群体在反对共产党的统治，并在民族主义和文化层面上批判它。然而，这些批评能否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取决于是否存在显著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认同。凡是存在民族主义教育的地方，反共者就能在大众中找到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外来的和反现代化的共鸣。这种反对活动采取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运动作为形式，比如1980年的“波兰团结”运动（超过1000万人参与，即超过成年人口的三分之一）或者是匈牙利的小型但同样可辨识的反对派团体。在斯洛文尼亚，一个民族主义的共产党领袖米兰·库潘在1986年掌权，带领共和国从南斯拉夫联盟中获得更大的自治权利，最终在1990年的人民选举（作为1980年代晚期由6个反对派组成的联盟的领导人）中达到顶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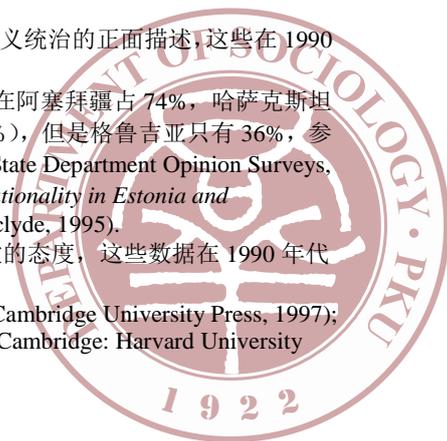
<sup>1</sup> See Jones Luong (fn. 11), chap. 3.

<sup>2</sup> 在1920年代的电影“献给列宁的三首歌 (Dziga Vertov)”里也有同样的对共产主义统治的正面描述，这些在1990年代中期在中亚受访者那里反复被提及。

<sup>3</sup> 根据国务院1990年代的调查，1994年被调查者中对俄罗斯持“喜欢”态度的在阿塞拜疆占74%，哈萨克斯坦78%，乌兹别克斯坦86%，吉尔吉斯斯坦83%，亚美尼亚90%（1992年是43%），但是格鲁吉亚只有36%，参见 See Regina Faranda, “Ties That Bind, Opinions That Divide” (Manuscript, U.S. State Department Opinion Surveys, 2001); 也可参见 David D. Laitin, *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Nationality in Estonia and Bashkortostan* (Glasgow: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1995).

<sup>4</sup> 1994年，81%的乌克兰被调查者和88%的白俄罗斯被调查者对俄罗斯持有喜欢的态度，这些数据在1990年代一直保持稳定；在西乌克兰，只有27%的被调查者把俄罗斯看成盟国。

<sup>5</sup> Andrew Wilson, *Ukrainian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A Minority Fait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Karel C. Berkhoff, *Harvest of Despair: Life and Death in Ukraine under Nazi Ru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06-13



不管是已经高度组织化的还是刚开始发展的反对派，都把战前的历史作为明确的参照。战前的民族节日，比如 8 月 17 日（布尔什维克战争中的维斯瓦河战役纪念日）或者 3 月 3 日（1792 宪法），给了波兰人一个机会在家中或阳台上悬挂波兰旗帜<sup>1</sup>。在 3 月 15 日即 1848 年匈牙利革命的纪念日，通过游行和口号来进行的纪念活动，很多都是以反共阵容来组织的。1989 年，当反对派的游行规模人数是匈牙利官方庆祝仪式参加者的五倍时，这个节日见证了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反对情绪<sup>2</sup>。

共产党政权变得越来越具有强制性，而学校教育则向民众灌输了“民族”认同，在共产党政权最后的日子，反对派精英组成了各种临时的大众运动的特别联盟。于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公民反暴力论坛”这样的仅成立于共产党垮台数周前的反对群体。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同样显示出，就算在没有根深蒂固的反对派组织的地方，共产主义也可能因为大众的反对而不得不退出。共产主义退出的根本原因，是民族主义教育培育的民众感情以及这些感情导致的意识形态比较，而不是反对派精英群体的力量本身。相反，共产党运用的策略也许能影响抗议的形式，但不能决定党的合法性或者阻止其权威的丧失。

一旦共产主义开始垮台，这些力量复苏了战前的民主党派（捷克社会民主党、匈牙利小农联盟），采用了历史上的制度设计（国会体系或者战前的宪法被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大量采用）。反对党各项举措的本质被浓缩进一个口号“回归西方”，这也是紧接着的民主化、市场改革和社会转型等重大举措背后的动机<sup>3</sup>。这并不是说战前时代被毫无保留地偶像化，但是很多反对派把共产主义垮台和建立新的民主统治的可能性看成回归“国家的自然状态”<sup>4</sup>。

前苏联内部发生的变异，恰恰与前共产主义时代的民族教育相一致。民众的反共运动发生在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西乌克兰。早在 1988 年，这些地区就发生了很多超过 10 万人规模的示威<sup>5</sup>。在这些运动中，组织者打出明确的“民族”旗帜，并且在旗帜上画出曾被禁止的前共产主义时代的象征物（两次大战之间的波罗的海旗帜，西乌克兰的蓝黄三叉戟旗帜，1918 年的格鲁吉亚旗帜，以及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的旗帜和象征）<sup>6</sup>。最大的抗议活动就是为了恢复前共产主义国家历史上的节日（比如独立日）而举行的。举例来说，1988 年由“国家自主联盟”在亚美尼亚举行的一次大规模游行，就是为了纪念亚美尼亚独立 60 周年。卡克林的观点与我们的认识相一致，即这些所谓的“历法示威”正是基于一个能促进社会动员的共享文化<sup>7</sup>。被禁止的前共产主义时代的颂歌、民族歌曲或者战时的反共歌曲也被用来动员大众反抗<sup>8</sup>。这些运动也提出修正共产主义历史叙述的要求，并且保护重要的民族或宗教设施<sup>9</sup>。在这些国家，反共的反对派不仅广泛地扎根于并且推动着民族主义运动，并且启用各种前共产主义时代的神话、象征和仪式。

这些民族主义运动直接上升为政治组织，并在 1990 年的第一次自由选举中战胜了共产党。格鲁吉亚在民族主义者兹维亚德·加姆萨胡尔季阿的带领下发起了“自由格鲁吉亚”运动。这个

<sup>1</sup> See Jan Kubik, *The Power of Symbols against the Symbols of Power*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Janine Wedel, *The Private Poland* (New York: 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 1986).

<sup>2</sup> Rudolf Tokes, *Hungary's Negotiated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318.

<sup>3</sup> Even the 1989 slogan for Kucns extremely liberal Slovene communists was “Europe Now!”

<sup>4</sup> See Padraic Kenney, *A Carnival of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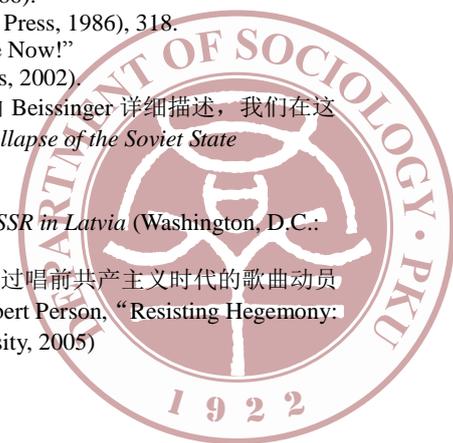
<sup>5</sup> 由于这些运动及运动中他们绘制民族象征符号和重大节日来动员大众的细节由 Beissinger 详细描述，我们在这里只大致介绍。参见 See Mark R. Beissinger,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ap. 4.

<sup>6</sup> Beissinger (fn. 80), 187.

<sup>7</sup> Rasma Karklins, *Ethnopolitics and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in Latvi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4), 94-95, cited in Beissinger (fn. 80), 169

<sup>8</sup> 例如在爱沙尼亚，“歌唱中的革命”就是再现 19 世纪晚期的民族歌唱节日，通过唱前共产主义时代的歌曲动员了人口中三分之二的人参与要求独立的示威，参见 Beissinger (fn. 80), 172. Robert Person, “Resisting Hegemony: Transformations in Estonian Identity under Soviet Rule” (Manuscript, Yale University, 2005)

<sup>9</sup> Beissinger (fn. 80), 180.



运动明确描绘了苏联时代之前的格鲁吉亚的伟大历史。在加姆萨胡尔季阿的民主主义议程中，包括谴责族际婚姻甚至苏联的工业进步，例如大型水利发电厂的建设，也被看成是对格鲁吉亚的生态破坏乃至最终目标是种族屠杀，它攻击苏联派来的工程师，认为他们来管理工厂的目的也是想同化格鲁吉亚。<sup>1</sup>

1980年代末期，在亚美尼亚，要求把阿塞拜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纳入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运动曾多次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群走上街头。卡拉巴赫事实上的领导人是里昂·特佩趋斯安，他引用了亚美尼亚对卡拉巴赫有合法统治权的传统故事。在1990年的第一次合法选举中，特佩趋斯安和卡拉巴赫委员会轻易地掌握了权力，特佩趋斯安成为了国家领袖。在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民族主义运动因为得到广泛支持而迅速上升为政治组织。他们都在1990年最高苏维埃选举中把共产党拉下权力高峰。在乌克兰，尽管受到基辅共产党领导机构的强硬镇压，在加利西亚的省会城市仍然发生了大量民族主义示威，并形成了“鲁克”组织。鲁克在1990年选举中夺得了地方政权，并且在1990年的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夺得了这些地区议会所有的席位。在乌克兰的其他省份，**只要是以前有民族主义教育的地方，共产党都失去了权力**。不光对乌克兰，对整个苏联也是这样：**凡是在共产主义时代才建立大众教育体系的地方，在1990年选举中，共产党都保住了权力**。<sup>2</sup>

在没有实行过民族主义教育的地方，反对共产党统治的精英就没有群众基础来汲取民族主义情感。所以即使存在强烈的共产主义的反对派，也无法激起大众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反对。民众的反对才是共产党倒台的直接原因，假如没有要求共产党下台的海啸，罗马尼亚共产党就能继续执掌政权，而他们的对手将会失败。1989年的内部政变仍使他们得以保持权力，一直到1996年的自由选举。同样，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1991年4月的自由选举中以56%的得票率保住了权力，直到1992年才下台。保加利亚似乎是民族主义教育和共产党退出关系的第一个例外：尽管之前曾有民族主义教育，1990年选举中共产党还是以47%的得票率组阁<sup>3</sup>。值得注意的是：各反对党取得的支持票加起来是超过50%的：主要的反对运动组织者民主力量联盟取得了36%的支持票，保加利亚全国人民联盟取得了8%的选票，而土耳其民族反对党取得了6%的选票。

总而言之，民族主义的学校教育制造了共享的合法政府的预期和标准，它在战后维持了反共情绪，推动了反对派的崛起。共同的压倒性的“回归正常”的愿望，使精英阶层形成了需要新的非共产主义政权的共识，即使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例子显示出精英承诺的民主本身更加不牢固可靠。民族主义是任意的，既可以与民主也可以与独裁政权共存。在民族主义是巩固民主还是破坏自由的问题上，不是民族主义的政治和行政团结的主张而是民族主义的内容起到了决定作用<sup>4</sup>。

## 五、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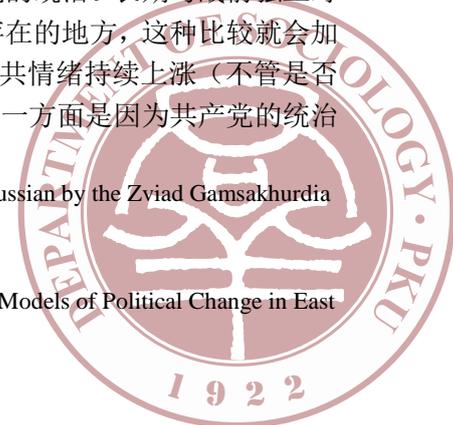
为了延长和加深共产党退出权力背后的因果链，我们认为共产主义时期前的民族国家的学校教育制造了共享的集体记忆和标准，从而使得大众不可能接受共产党的统治。长期与战前独立时代的情况以及临近非共产主义国家进行比较，意味着民族主义教育存在的地方，这种比较就会加强反共的程度。因此，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几十年的这些比较，使得反共情绪持续上涨（不管是否高度组织化）。在更短的因果链中，这种反对导致了共产党的退出，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党的统治

<sup>1</sup> Zviad Gamsakhurdia, "Open Letter to Eduard Shevardnadze",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the Zviad Gamsakhurdia Society in the Netherlands, April 19, 1992.

<sup>2</sup> Beissinger (fn. 80), 194(R) C98; Wilson (fn. 75)

<sup>3</sup> 他们于1991年自己的政府垮台后就退出了政坛。

<sup>4</sup> See Milada Anna Vachudov and Timothy Snyder, "Are Transitions Transitory? Two Model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East Central Europe since 1989",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11 (Winter, 1997)



已经失去民众，另一方面因为反对派提供了一个突出的更具合法性的统治选择。与此相反，在学校教育遵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地方，没有这样容易带来反对情绪。甚至，在这些地方普遍的认识，是认为共产党的统治带来了现代化和随之而来的进步。

需要对共产主义的权力退出精确找到被早期现代化分析确认的因素中哪个能够改变大众的观念和对好的治理方式的判断。而在这些早期的分析中，教育、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是捆绑在一起的，我们的研究表明是大众学校教育和它传播的民族的内涵影响了共产党统治被当成合法或非法的程度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它的反对的动员。其他因素彼此相关，但他们没有解释共产主义世界的发展或者它最终崩溃的轨迹。

学校教育的时机和内容比那些相竞争的模式解释了更多的变化，同时也补充了那些模式。这里介绍的理由阐述了地理上的接近和战前遗留问题的基本机制，并说明为什么反对派出现在首位。这些扩展以及对共产党退出背后的关键的解释是对个体和社会行为的微观基础的重新考虑：共享的理解，期望和对合法统治的标准。这些概念是为什么反共产主义即使并非总与民主相连，也总会和民族主义相连。民族认同也可能有助于激励这些国家经受痛苦的市场化改革的低谷和混乱的政治变革，使大众接受改革所带来的必要的牺牲。这可能正是文化重要性的一个方面：不是作为对特定行为的结构倾向性，也不是作为对具体制度措施的亲和性，而是在历史上产生的一套对政府的起源、合法性和表现的共享的标准。

附录 1. 识字率与共产党的退出

	共产主义学校教育成立之初的识字率	前共产主义时代课程内容	第一次自由选举中非共产主义政党的席位	前共产主义时代的城市化水平	前共产主义时代实行民主制的年数	ECE
捷克	99		84.0	25.0	20	1
爱沙尼亚	99	民族主义	74.3	33.0	14	0
匈牙利	96	民族主义	83.2	42.5	4	1
拉脱维亚	93	民族主义	73.0	36.0	14	0
斯洛伐克	92	民族主义	85.0	15.0	20	1
斯洛文尼亚	91	民族主义	87.0	9.3	8	1
波兰	79	民族主义	87.0	20.0	8	1
立陶宛	77	民族主义	67.3	15.0	4	1
西乌克兰,加利西亚	70	民族主义	95.7	8.0	8	0
匈牙利	69	民族主义	48.0	0	0	1
克罗地亚	68	民族主义	75.0	8.0	8	1
格鲁吉亚	65	民族主义	74.0	0	0	0
罗马尼亚	57	民族主义	33.0	0	0	1
亚美尼亚	56	民族主义	89.8	0	0	0
摩尔多瓦	46	民族主义俄罗斯	54.4	0	0	0
东乌克兰	46	俄罗斯,罗马尼亚	13.9	0	0	0
俄罗斯	44	俄罗斯,亲俄罗斯	14.0	0	0	0
白俄罗斯	42	俄罗斯	21.0	0	0	0
塞尔维亚	35	西部:波兰,俄罗斯; 东部:俄罗斯	22.4	8.0	8	1
马其顿	30	民族主义	74.7	8.0	8	1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28	南斯拉夫,克罗地亚, 塞尔维亚	79.2	8.0	8	1
阿尔巴尼亚	20	宗教	32.0	13.0	8	1
阿塞拜疆	20	俄罗斯	22.2	28.0	5	1
哈萨克斯坦	18	俄罗斯	5.6	9.0	0	0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	12	俄罗斯	0	12.0	0	0
乌兹别克斯坦	11	俄罗斯、土耳其、阿拉伯	5.0	22.0	0	0
土耳其斯坦	10	俄罗斯	5.0	14.0	0	0
塔吉克斯坦	4	俄罗斯	5.0	10.0	0	0

附录 2: 操作化

共产党的退出

我们使用第一次自由选举中，共产党以外的候选人在国会中夺得的席位作为指标。我们测量



席位是因为，前苏联解体后，计算不同的候选人得到的选票是不可得的。其次，获得的席位是对共产党是否掌权的更直接测量，而这正是本研究感兴趣的变量。然而，不管是将共产党的退出按席位计算还是选票计算，结果在统计上都是可信的。

ECE 的第一次自由选举是在 1990 至 1991 年。对于南斯拉夫和苏联，第一次自由选举发生时联邦机构形式上仍然存在，所以我们使用对共和国主体的选举。对于后苏联时代的国家，第一次自由选举是 1990 年春天对于最高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那个时候，共产党已经停止垄断权力，媒体相当自由多元，所有居民都可以投票，候选人的提名或政治动员几乎没有限制，并且除俄罗斯以外，规则和制度为各共和国共有。在 1990 年的春天之后，其中一些国家再也没有举行过自由选举，它们要么否认了民众的实质投票权，要么取缔了共产党。

### 前共产主义社会的识字率

我们使用前共产主义社会的识字率。除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以外，这个指标简单地就是指共产党开始掌权时的识字率。对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我们使用 1933 年的文化普及率，那年共产党开始替换前共产主义社会的民族主义学校教育的课程体系。

### 民族的涵义

在一些情况下，前共产主义社会的学校教育并不是培育名义上的民族主义。马其顿人就接受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教育，并被教导是塞尔维亚人。俄罗斯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学校官方语言，学生被教导是俄罗斯人。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还编写了二分变量，以确定前共产主义国家学校教育中的名义上的民族主义的涵义。

### 前共产主义社会的城市化水平

由于计算 GDP 很困难，尤其是在省的层次上计算，所以我们使用城市化水平作为替代的变量来控制共产主义获得政权时经济发展的水平。城市化与工业化高度相关：1945 年，在人口超过百万的国家中，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相关系数是 0.885<sup>1</sup>。在前共产主义社会，工业的发展与庞大农村人口并存，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sup>2</sup>。边远地区也有一些工业，比如在波西米亚的土地上存在一些纺织品工业<sup>3</sup>。然而城市中心是现代社会的缩影，是“工业、贸易、银行的根据地和象征”<sup>4</sup>。

### 实行民主制度的状态

我们使用克切特的方法，即使用共产主义执掌政权前，独立的实行民主制度的年数。

### 与西方的距离

我们复制了凯普斯坦和瑞利<sup>5</sup>的编码，计算一个城市与柏林或维也纳两城市中更近的距离。对于乌克兰，我们将基辅定为东乌克兰的首都，利沃夫定为西乌克兰的首都。

---

<sup>1</sup> Thomas Wilkinson, "Urban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June 1960), 357.

Urbanization here is defined as th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residing in politically defined cities..

<sup>2</sup> See Ivan Szelenyi, "Urban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Management in Eastern Europe," *Theory and Society* 10 (March 1981), 180. Ivan Berend and Gyorgy Ranki,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Central Europe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154.

<sup>3</sup> Gale Stokes, "The Social Origins of East European Politics," in Daniel Chirot, ed., *The Origins of Backwardness in Eastern Europ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217.

<sup>4</sup> Berend and Ranki (fn. 90), 310

<sup>5</sup> Kopstein and Reilly (fn. 5).

